



重走与重构，寻找传奇的起点

——专访《重走：在公路、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》作者杨潇

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晶 通讯员 余婷雪 谢宁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三校迁到长沙，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（以下简称长沙临大）。1938年2月，长沙临大湘黔滇旅行团开始西迁之路，闻一多、黄钰生、袁复礼、李继侗、曾昭抡、穆旦、杨武德、任继愈、刘兆吉、林振述等师生300余人，历时68天横越中国西南腹地三千余里，抵达昆明，与另两路师生会合，组成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。

“如今西南联大早已成为不折不扣的传奇故事，关于联大在昆明的八年，不论大众叙事，还是学术研究，都已汗牛充栋，这很好理解，因为这八年太重要了，也太长了。比较起来，我为什么要关心八十年前一次仅仅持续两个月余的行军？”

近日，作家杨潇做客长江讲坛，与读者分享作品《重走：在公路、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》（以下简称《重走》），并接受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专访。

从书信和日记里，了解鲜为人知的开端

《重走》讲述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，讲述的方式正如书名，重走西迁之路，在公路、河流和驿道上寻找，“因为这是传奇的起点。”

《重走》的第一部分放在了长沙临大，此前鲜有人对这段时长半年的经历有详细的描述。

长沙临大在1937年11月1日开学，紧接着一个多月里，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，这对临大师生是非常剧烈的冲击。《重走》书中引用其时老师和学生们的日记、回忆录，描述当时的情境：大概是南京沦陷的第二天，长沙临大的学生会主席洪同就在位于韭菜园的圣经学院的操场上，发表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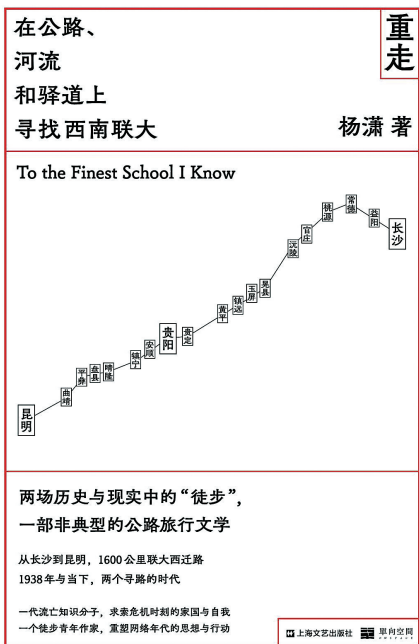
讲，动员大家弃笔从戎，不要读书，上前线。学生对前线有着很多浪漫的想象，上前线也不意味着冲锋陷阵，那里充斥了各种日常琐碎的工作。有的人可能还没走到前线就回来了。长沙临大的学生人数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，因为学生老是不停地走，又不断地回来。

“这是西南联大的开端。”杨潇说，当我沉浸到历史里去搜寻，在阅读了大量的史料之后，尤其是一批西南联大老师和学生的日记，会发现那个时代的青年有着更多的面相，而不仅仅只是我们以为的那种“救亡图存”、铁板一块的状态，尽管是那个

时代的底色。

长沙临大，是一所随时可能解散的大学。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1937年12月26日给父母写信提到，这里的上课情形已不比寻常，教员请假往往一走就是几星期，又听闻学校经费并不困难，而且能继续上课，给教员发薪应该也不成问题，唯一的担心就是时局更加恶化，学校被迫根本解散。南开大学教授柳无忌《南岳日记》里写道：“大家都有一印象，以为临大命运即将告终，我们都有作‘鸟兽散’之可能。”

《重走》的每个章节后都附有长长的注释，读者可以看到书中史料的



来源。《重走》如同一部多声部作品，杨潇把散落于传记、日记、回忆录、地方文史资料、档案、口述史的零星东西整合起来的。杨潇希望自己的文本是开放性的，他更希望把判断权交给读者，而不是要告诉读者一个什么结论，“每个人都可以寻找到自己的声音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与自己共情的地方。”他希望读者也能从中得到激励，在困顿、灰暗的时候，沉下心，静下心，埋头做事。

进入历史深处，发现名人各面与社会生态

下去。“读过这段文字，再看网络公众号上有些写林徽因的文章，是多么地轻浮，不接地气。”

在寻找史料、重走和写作的过程中，杨潇刷新了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认知。在杨潇看来，闻一多不独是中国现代诗人、学者、民主战士，他更是一个丰富、生动的人。杨潇在书里多次引用闻一多的书信，其中有许多很有意思的细节，比如他在的一封信中抱怨妻子，袜子为什么没给他洗，他因此不得不学着洗袜子，还说“这里吃的不好，荷包蛋都臭了”。而在另一封信中，他因为拒绝了顾毓琇的邀请去汉口做官，令妻子有些不满。他动身去长沙的

夜里，妻子没有起身相送，他写长信说，动身那一晚“话没有说完喉咙管硬了”，他感慨“四十岁的人，何以这样心软”。在杨潇看来，闻一多的书信特别动人，一个人的节操、个性，甚至任性，都在其中。

“不要动手打人——我要接吻你一百次——拔草也没有心思——沉在水里争一个把手——害怕报应——一个人的生活可以简化到什么程度——民治主义在日本的没落——一家这么大带什么东西走最好——用冰箱防空袭——九江的观音一胡椒孔的乳罩”，这一串词是《重走》第一章“长沙：和平的最后一瞥”题目下的关键词，每一章的正文开头，都有这样一串

寻找当年的“东门”，重建历史时空

天，“在这样一个夜晚，他们的讲述和我阅读的日记、史料交织在一起，再稍稍用一点想象力，那些被拆毁的老房子就一排排立了起来，那些早已被‘下脚’（填作地基）的石头也一块块破土而出，城门、城墙像拔节的竹笋一样快速长高……”

跳跃、穿插、交织，《重走》构建起时空交叠的场景，很多时候杨潇本人也在里面。杨潇采访“联二代”赵新那，她的赵元任之女，看到一张照片，“我尤其留意到赵元任和家人友人们在沃克街27号那栋米黄色两层小楼——这栋房子离我2013年访美期间租住的公寓相隔只有数十米，在阳台上就能望见——楼前的几张合影，有一张是与胡适，他穿着黑色的大衣，左手提皮包，右手拿帽子，两腿笔直地站在雪地里，表情有点拘谨。那是我熟悉不过的雪后初晴的波士顿，几乎可以嗅到空气里融雪剂的气味。”

杨潇说：“感性也是进入了历史的一种方式，历史不是冷冰冰的，感

性并不会导致对历史的误解，它能帮助你调动更多感受触摸历史。”

《重走》2021年出版后，斩获多个文学奖项，杨潇在采访时表示，目前这部书已加印11次，销售十几万册，远超他的预期。一直有读者询问行走的意义，“1938年的湘黔滇旅行团，还是80年后我的重走，都有寻路的意义。”杨潇在书中说：“我迫不及待要和八十年前那些最聪明的年轻人一同出发，激活曾经的简单、热忱与少年心气，同时，也冀望着有一些若隐若现的银线能牵起1938与2018这两个看起来并无关联的年头——譬如，在不确定的时代，什么才是好的生活？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？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？”

在《重走》的尾声部分，湘黔滇旅行团成员、已过百岁的吴大昌对杨潇回忆起一件往事。在2012年或者2013年，吴大昌在书店里看到一本《冯友兰论人生》，拿来翻一翻，有一篇叫《论悲观》，“这件事情我完全忘记了……哎，一看这篇我就起来了，

这篇文章是为我写的。”

1939年，西南联大在昆明的第二年，21岁的吴大昌陷入对“人生意义”的困惑中。他写信给冯友兰，冯友兰约他面谈，后来又写信给他，说自己写了一篇叫《论悲观》的文章，发表在《云南日报》上。“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’，恐怕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。”冯友兰在那篇文章里写，“我们可以问：结婚的目的是什么，读书的目的是什么？但人生的整个，并不是人生中的事，而是自然界中的事，自然界中的事，是无所谓有目的的或无目的的，我们不能问：有人生‘所为何来’，犹之我们不能问：有西山‘所为何来’。”但这“没有意义”，并不等于不值得做，或者不值得做，因为人生“本身即是目的，并不是手段”。

杨潇采访吴大昌时，老先生已101岁，此时的他认为冯友兰说的是对的，“人生就是，活着就是活着……人生问题就是这样子，你好好过生活，你在生活里过好生活，就没有问题”。

史前千年，远古之光

“经天纬地，谓之华夏。”在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的新书《经天纬地》中，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，分析了地域融合与文化认同的跨时代过程。书中最让我颠覆认知的是神话于历史的作用，许倬云以五帝和蚩尤等神话为例，将我们带入了一个由神话与现实交织的世界。

在古老的神话中，黄帝、炎帝、蚩尤等都是具有神力的存在。黄帝有四张面孔，可以同时看到四方万里以外；蚩尤人身牛蹄，四目六手，率领着大批猛兽和魑魅魍魉；而炎帝则在与蚩尤的战斗中败北。幼时读这些神话故事，只觉得神秘有趣，如今读许倬云的剖析才明白，上古神话背后，隐藏着巨大的文化密码。

上古神话里记载三皇和五帝的对抗，三皇就是以炎帝、黄帝为首，五帝以蚩尤为代表的集团。翻阅大量古籍，战役最后是以炎黄为首的阵营打败蚩尤。如此神话背后的真相是，炎黄所代表的其实是早期的农耕集团，而蚩尤领导的是采集部落。炎黄打败蚩尤的过程，其实就是从狩猎转变为农耕的过渡期，两种力量的对峙中，蚩尤的战败则体现了农耕业逐渐取代采集业的过程。而史前没有文字的记载，这些流传下来的神话成为了我们寻找记忆的线索。

打败了采集部落的炎帝和黄帝，能否在中原和平相处呢？炎帝是种地的烈山氏代表，黄帝是驾车的轩辕氏代表。根据古籍记载，炎黄的故事在中原东西部都有出现，但驾车驯马的轩辕氏，显然是外来的。公元前五千年左右，轩辕氏来到中原以后已经驯服马匹替人类劳作。而炎帝部落是中原北部土生土长的农耕集团，享受河套平原天然的肥沃资源。两者本就互不干扰。当时遭遇气温骤降，西部部落逐渐南迁。姬姓的黄帝和姜姓的炎帝就此合作对抗西边族群。后来古籍记载的姬发与姜太公的合作，其实就是后人对炎黄记忆的投射。如此说来，神话本身如线索一般，将远古印象投射在后人身上。

考古学家发现一件神奇的事件，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，不管是太行山下的遗址群，还是四川、云南、山西等多处遗址，都发现了一个共同之处，他们的部落或者族群里都有一个治水的祖先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禹治水，据考究，公元前2000年左右，地表气温低，属于寒潮期，本该冰冻的中原，何来治水这一说？这本书里记载了起因经过，大致是因为青藏高原上的大堰塞湖因地震造成山体滑坡，大量的湖水滔天威势，奔腾而下，形成了巨大的洪水。或许就是这一场大水，成就了许多部落英雄，而他们的事迹则被后世记载传唱了。神话故事给上古英雄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但也留给我们一丝循迹真相的线索。

远古的历史终究如缥缈的云烟，许多史实我们都无从考证。而那些逐渐老去的远古神话，却是我们寻找身份认同和文化根源的珍贵线索。

好看是一本小说的责任

读《穿左门、走直道》

金颂

在文学评论的当代语境下，以“好看”加诸一本小说，不仅读者立即视为下品，难登大雅，作者也必敬谢不敏，避之唯恐不及。然而，如果晦涩并不意味着高深，又岂能将好看视为浅薄？大仲马的《三个火枪手》以通俗小说跻身世界名著，金庸小说被封为“成年人的童话”而风靡华人世界，经久不衰。可见，好看并非小说的原罪，而是必须承担的基本责任。

郦元平的《穿左门、走直道》就是一本好看的小说。小说描绘了供销社面对市场经济大势、纸媒行业变局，锐意改革谋发展、积极转型铸辉煌的恢宏画卷，集中塑造了王道、龙昆仑、杨柳、江一石等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，在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中体现创业艰难，在激烈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凸显人性复杂，“倾情记录传统纸媒业的恢宏与凄美，真诚书写现代纸媒人的辉煌与抗争”。

中国是纸媒业大国，期刊林林总总，蔚为大观。然而，反映期刊人工作、生活的文学作品却屈指可数，乏善可陈。特别是近年来，随着数字化媒体冲击，期刊乃至纸媒遭遇生存困境，风雨飘摇，倒闭、休刊者众，显得悲壮而无奈。我们正处在一个纸媒落幕的时代，亟需反映历史真实、记录时代巨变的伟大作品，但文学再度缺席，令人扼腕。

这一半大约是因为隔行如隔山，行业外的作者写来总不免隔靴搔痒、雾里看花，因而限于下笔。而另一半恐怕是子要打在期刊人自己身上。面对熟悉的生活，能编会写的期刊人为何却少有创作的冲动，这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或许，期刊人还处在应对自身及行业转型的忙乱之中，无暇他顾。更何况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自己写自己也不是想象中那般容易。

好在还有郦元平。多年期刊工作的酸甜苦辣、同事朝夕相处的深厚友情，都使他有一吐为快的冲动。对期刊工作的熟稔又使他无需体验生活，从而直接进入创作状态。于是，他调动所有人生积累，“深挖职业之井，然后用木桶舀出一桶职业味极浓的水。”这便有了《穿左门、走直道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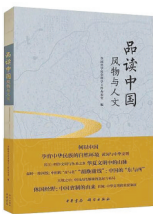
说这本小说好看，首在曲折变幻的情节。多年《今古传奇》的编辑经验使得郦元平深谙吸引读者之道，知道怎么写才能牢牢抓住读者。小说情节、结构极富设计感，常常是一波未平、一波又起，令人应接不暇、眼花缭乱。有时是一个事件套着一个事件，层层剥笋、细致解套。有时是多条线索齐头并进、全面铺开，草蛇灰线，伏脉于千里之处，吸引读者四面出击、追踪蹊迹。作者运用大量的人物对话和叙述语言推动情节发展，既无冗长的心理描写，场景描写也十分简约克制，使得整本小说极具画面感，如果能改编成电视连续剧，一定有着不错的收视率。

人物形象的塑造也颇为成功。小说人物众多、面目各异。由于作者长年与他们生活在一起，对他们的一举一动、一颦一笑莫不了然于胸，因此人物塑造得既真实可信又摇曳生姿。王道的周全妥帖、龙昆仑的强势霸气、杨柳的咄咄逼人等无不栩栩如生、跃然纸上。在人物塑造上，作者极力避免扁平化、脸谱化的倾向，努力写出人的多样性、复杂性。如以作者自身为原型的主角王道，既写出了他中庸平和、做事周全的一面，又暴露出他优柔寡断、处事不决的短板。而于石光华，在控诉其利用权势长期霸占夏小荷的同时，又让他在深切的忏悔和赎罪中泛出人性的微光。

作者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小说出来后，得到最大的肯定便是，大家喜欢读！三十余万字，不少人三四天一口气读完。”我正好也是“不少人”之一，惊喜于同道者众，感受到这是一本好看好读的书。然而，好看又似乎不是这本书的全部，读之给人力量，也促人思索。作者也许没有为期刊人立传的雄心，但确实写就了一首荡气回肠的期刊史诗，塑造了一群可歌可泣的编辑群像，不愧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佳作。

从这个意义来说，《穿左门、走直道》是一本好看的小说，又不仅仅是一本好看的小说。

【“中国好书榜”2023年9月好书推荐】



《品读中国：风物与人文》
□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
中华书局科学出版社

本书由自然编、人文编、中外编三部分组成，简明扼要、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中华大地上的自然风物与人文创造，述说大江大河所孕育的厚重文明，展示了人文遗产所承载的人文精神，揭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和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。



《西迁大先生》
□ 卢黎歌 主编 贾韵鸣 李重 副主编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
本书从“西迁精神”“科学家精神”的内涵出发，讲述了西安交通大学8位教授在西迁过程中发挥的带头作用，以及在科学研究、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突出成就，彰显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非凡的人格力量。



《苏东坡和他的世界》
□ 王水照 著
中华书局

本书分为综论十题、苏海拾贝、诗词讲解、苏文简释四个部分，从不同角度呈现了苏东坡的生平思想、文化世界和诗词文章之美，展现了苏东坡丰厚旷达的人格魅力。



《濮存昕：我和我的角色》
□ 濮存昕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本书以濮存昕曾经饰演过的角色为主线，分享了他在演艺道路上的探索故事和创新思考，展现其丰富的内心世界，抒发了对戏剧艺术的敬畏和热爱。